



LIULANGZHE流浪者 DE的 QIJI奇迹

○巴山茶痴 ○比丘尼和她的信徒们 ○台儿庄

敢死队长沉浮录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

作家

王 蓬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流浪者的奇迹

王 蓬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师大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700册

★

ISBN7-5059-0362-4/I·230 定价：5.4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五部中篇人物传记组成。所写对象全系身世独特，经历曲折，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

血战台儿庄敢死队队长的沉浮遭际；塞外乡村的一位贫穷回族青年，读完三所大学，奋斗成为作家的苦难历程；女尼姑及其信徒们，在寻求精神归宿中，各自心灵的悸动、颤栗和挣扎；茶痴为育名茶，滞留深山几十年之痴；流浪者为证明一种尊严所付出的种种惨痛代价，皆被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真实勾勒出来。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展现出强者的创造和痛苦，强者的希冀和追求，强者的呐喊与抗争。



作者小传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已进入不惑之年。其中大半在陕南乡村度过，并因此与文学结下缘分。先后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作家班。

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山祭》；中短篇小说集《油菜花开的夜晚》、《隐秘》、《黑牡丹和她的丈夫》；散文集《乡思绵绵》、《京华见闻录》等，并涉足纪实文学。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陕西分会理事，汉中地区群艺馆专业作家。

时代情绪的真实透视

韩 梅 村

其实，从严格意义讲，一切文学作品都应当被看做是作家对时代情绪的一种捕捉、把握和透视。

这些年来，作家王蓬除部分记事抒情类散文外，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其先后已向我们提供了短篇小说集《油菜花开的夜晚》（陕西人民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隐秘》（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篇小说集《黑牡丹和她的丈夫》（漓江出版社）、长篇小说《山祭》（漓江出版社）等多部作品。在这些小说作品中，作家通过其笔下人物具体生活道路和心灵历程的艺术展示，生动传神地透视了一代人们的心态和情绪。

然而，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需要向来都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虚构的小说之外，也还需要以真人真事为观照对象的文学作品的补偿。作家对艺术的追求其实也是多向度的。虽然对每位作家说来，其艺术传达方式总会有所侧重，或诗歌，或散文，或小说，但却没有一位作家甘于固守一隅。

我认为，促使王蓬创作这组以真实人物为表现对象的报告文学作品的直接动因，是其笔下人物奇特的人生经历，非凡的个性气质和典型的社会心态所凝成的特殊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并打

动了作家那颗深沉而敏感的心的缘故；而且一旦当其进入具体艺术创造过程，社会和历史使命感，则更直接驱使作家正确揭示社会和人物之间各种复杂的关系和联系，通过人物实际生存状态和曲折命运的真实描述，达到对一个时代整体情绪的准确透视和概括。作家精心创作的《巴山茶痴》，在参加《人民日报》建国四十周年报告文学征文的1650余篇作品中，第一批拿到了“入场券”，其于1989年9月10日刊出后，很快就被《新华文摘》编辑部诸公转发于该刊当年11月号上；而在《人民日报》1990年2月25日公布的评选结果中，《巴山茶痴》又荣获“优秀奖”，位居榜首。应当说，这是全社会对作家报告文学创作劳绩的一种回报和奖掖。

—

报告文学特质，是其以文学样式，报告“人”及其从事的各种活动。王蓬的五篇报告文学作品，单看题目，即可断定，其均以“人”为观照对象，主要致力于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展示。因此，写好人物，通过人物外在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的描述，努力写出人物性格中具有本质意义的特征，当是这类作品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和最终保证。

关于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曾作过一个最全面而又相当简洁的理论概括。他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其社会性。举凡历史全部深厚基因，现实社会各种复杂联系，都将通过活脱脱的现实的人，或隐或显，或浓或淡地透现出来。

然而报告文学毕竟和小说不同。小说可以通过表象的分解和综合，从生活富矿中，抽绎出符合作家审美需要的一切有意义的细节和情节，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之表现出一定时代生活的

律动，折射出一定社会的心态和情绪。而报告文学则不允许如此。作家所面对的，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或事件，其要求于作家的，只能是以文学的样式，如事实原型那样，向世人如实“报告”其事件原委或主人公命运遭际、生活道路等。因此，其事件或人物经历本身就要求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有其摄魂夺魄的内在魅力。无典型意义的事件或人物，是没有资格进入作家视野的，因其无法使作家通过人物或事件的真实描述，对时代心态情绪和律动作出准确而真实的透视。同样，缺少内在魅力的事件或人物，也不能成为作家观照的对象，原因就在于缺少魅力。而这两者在生活中往往又是统一的，而且最终是以其独特性而显示出来的。即大凡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人物，其本身即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在；从另方面说，凡具有某种传奇意味或神秘色彩的事件或人物，其大多数也因从某一侧面折射了时代而具有了典型性。因此，全力寻找具有独特意味的人物或事件，就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创作过程中首要的一环。

王蓬的这五篇报告文学作品，毫无疑问地具有一种独特性品格。台儿庄战役，是我国抗日战争历史上一次颇为著名的战役，是中华爱国儿女以其血肉之躯抵御外侮、捍卫民族尊严的一次壮举；而作为这一战役的敢死队队长，其姓字名讳、乡里籍贯、个性气质、生活道路，及其现状等，无疑是人们想要知道的。“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作家”，究竟是何等样一个作家？“流浪者的奇迹”之奇，“巴山茶痴”之痴，“比丘尼和她的信徒们”心理行为种种，也都会激发起人们浓厚的探究兴趣。

然而，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专集，尽管追求其传奇性和娱乐性也不失为一种追求，却只能算作一种浅层次追求。对于一个严肃的具有时代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来说，理应有更高的追求。作家王蓬在向读者展示其笔下主人公曲折的人生经历时，非常重视其与周围人物，特别是社会环境之间复杂而广泛的内在联系。他从来

不将作品主人公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只看做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将其置于社会总体背景之下，复杂的人生网络之中，予以客观而冷静的艺术观照。所以尽管其笔下人物经历大都具有一种鲜明的独特性甚至于给人一种浓重的传奇色彩，但由于作家在具体处理其与人、与社会关系时，居高临下，总览全局，使人感觉到，历史似乎在这里打了个弯，形成了一股回流，因此，社会的全部心态情绪，都集中投射到了人物身上，并通过人物独特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出来。故尔人们从作家描述中感知到的，将不是个别意义上的悲欢离合，而是对整个时代情绪的把握与思考。

当年台儿庄血战敢死队队长王范堂无疑是个传奇式人物。然而作家在具体描写过程中，却没有有意突出其性格中传奇性一面，而是充分注意到其行为心理的社会意义，将主人公个人命运与中国社会律动紧密融合在一起，从社会的嬗替变化中以“显示”其行为的意义和价值。

在王范堂生命里程中，其不仅有过担当台儿庄大战敢死队队长的光荣经历，有过跟随董振堂、赵博生参加宁都暴动，进入中央苏区，亲眼目睹毛泽东、朱德风采的辉煌历史，而且能够在历史关键时刻，审时度势，机警躲开蒋介石严密监视，冒险率部投入人民怀抱。

作品通过真实而生动的艺术笔墨，深刻揭示了王范堂从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到走向人民，并非其行为的盲目，或是一种被逼无奈后的屈从，而完全是一次受理智支配的自觉行动。无疑，作为一个从历史深处蹒跚而来的生活中的具体人物，王范堂有过遗憾，有过悔恨，然而就其一生行为总体倾向而言，则不能不承认其为一代俊杰之士。这不仅表现在其最终走向率部起义道路这一重大人生抉择上，而且贯穿于整个青壮年时代生命历程之中。作品以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艺术笔触，无所辩驳地记叙了王

范堂在著名的娘子关战役，特别是台儿庄血战中的杰出行为。其于惨烈的台儿庄血战中，为了祖国神圣领土不被侵袭，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率部下仅剩的57名兵士组成敢死队，重新夺回台儿庄西北角，打开守庄部队与后方通道，从而保证了整个战役的胜利，这充分表现了一个中华儿女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和献身精神。

毫无疑问，如火如荼的抗日环境是促使王范堂作出正确人生选择的一个重要条件。然而作为行为主体的王范堂，其个体人格对其人生道路的正确选择仍起着重大作用。其次，其中下层社会地位，使其有更多机会通达普通民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再次，其“爱动脑筋，善用心思”的性格特点，则使其善于从宏观上捕捉并把握社会发展总趋向，不断调整其心理和行为方向。正是这些个人的禀赋和气质，最终使其在复杂难测的形势面前，作出了尽可能正确的行为选择，并且以其勇气和智慧，演出了血战台儿庄的历史壮举和率部起义的人生正剧。

是一种生活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巴山茶痴》和《流浪者的奇迹》主人公蔡如桂、何兴文等人，都程度不同地遭遇过蹉跎命运的严酷折磨。

“巴山茶痴”蔡如桂为了祖国茶叶事业，不仅自己放弃了生活条件远优于陕南山区的工作单位，而且说服妻子从城市迁来山区。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岁月里，他克服各种困难，一心扑到名茶研制事业上，而且成绩斐然，连获各级奖励，并当选为县人大代表。然而他的骨鲠脾性却害了他，被人借机诬陷，竟以骇人罪名，投进监牢。面对现实处境，“抚着为扛制茶机械在冰雪封山的路上摔伤的右腿，为组装电炒茶锅碰瞎的左眼”，其深感痛心。然而这种深自哀惋的情愫在蔡如桂的心灵世界中，似乎只是短暂的一瞬。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他把其它一切都忘了：在铁窗高墙之中，一面拼命吸吮有关茶叶最新理论，一面总结十数年

间积累的大量实践经验，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提出了到茶山继续其实验的请求；一经获释，他即刻奔赴茶山。他的得意之作“秦巴雾毫”就是在身负沉重政治压力下心血的结晶。应当说，直到1988年底，由于地县领导的一再过问，加给蔡如桂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辞”才被统统推倒，时间是过于晚了些，但还是足够令读者和蔡如桂亲友激动一阵的。然而对于已经将宠辱一概置诸脑后的蔡如桂来说，虽然这一喜讯也足令其深感快慰，但他却已无暇感叹命运的多艰，其一心挂虑的，竟是如何使连获四个大奖的“秦巴雾毫”迅速走向世界！

何兴文当初不过只是四川绵阳地区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而已。在是非被颠倒了的那种年月里，他靠手艺赚回点钱，娶妻造屋，竟至招来大祸，除其收入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光割净，本人被“批倒批臭”之外，并且还要将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腿”打断。受生存意识支配，何兴文“越大渡河，过金沙江，沿门乞讨，四处逃亡”。不仅其本人，全家都跟着受牵连，由此演出着各自的人生悲剧。只是到了历史新时期，何兴文才获得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成为一名优秀的农民企业家。

无论是王范堂，还是蔡如桂、何兴文，尽管其生活历史跨度长短不一，加之其所处具体生活环境、个性气质所造成的命运蹇涩程度也不完全相同，但由于作家真实而具体地写出了其在时代总体律动中复杂而广泛的社会联系，及其具体地位和作用，所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仅是其“单个人”政治地位的荣辱盛衰，而且在其身上还凝聚着、负载着整个社会的心态和情绪。

在《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作家》中，通过主人公回族作家查舜坎坷奇特人生经历的艺术描述，王蓬又向我们展示了另一条色彩特异的人生命运曲线。在查舜的人生道路上，虽然也有极“左”思潮对其心灵的严重创伤，更多的则是属于一种个人的特殊不幸：母亲早逝，兄长分居，与年迈父亲相依为命，三年灾害时期几至

丧生等。查舜经历的奇特之处在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他被招收为粮站临时搬运工，竟能以此为转机，一步步，由扛包工而收购员、开票员、转为正式工人，而小学教师、七年制学校校长、教育学院学生，而先进集体和个人、全国青联委员，而短篇小说《果园里的孩子》、中篇小说《月照梨花湾》、长篇小说《穆斯林的儿女们》，而鲁迅文学院学员、北大作家班学员、知名青年作家。在这一系列变迁中，同样也凝聚着一种时代的情绪和心境。

《比丘尼和她的信徒们》又与上述作品不同。作品主人公青及其信徒虽然皈依空门，然而由于人世间根本就不存在“佛门净地”，所以其总要与一定社会现实生活保持千丝万缕联系。这不仅突出表现在“信徒之四”的经受不住世俗生活诱惑，很容易地就与师傅分了手，复又投入现实生活的怀抱；也不仅突出表现在“信徒之八”的朝拜神灵，只是为了乞求神灵保佑其稳稳当地发财；而且突出表现在，其中多数的遁入空门，都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生活或心理障碍，迫不得已而投身空门，希求从“佛”那里得到解脱或保佑的。所以从作家对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娓娓叙述之中，人们看到的，依然是作家对一个时代整体情绪的总体把握和犀利透视。

二

以文学形式“报告”生活中真实人物和事件的报告文学，特别是那些传记式的报告文学，其特质既决定了它的独自魅力，也显示了它的特殊困难。它不能象通常意义的小说那样，“杂取种种人”（鲁迅语），凭借情节细节的虚构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而必须追求事实的真确；尤其是当代人物的文学报告，其主要观察、调查对象就是当事人自己，作家笔下所记述的一切，都需要得到当事人的首肯。当事人的心理障碍则首先会成

为障壁。由于一种十分复杂的原因，当事人即使偶尔向作家讲述过去的经历，又往往是粗线条的，不肯透露细节，常常有意要隐去一些属于自己或他人隐私的部分，等等。所以，尽管作家用尽浑身解数，得到的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物原型。其次，进入创作过程后，创造主体所出现的心理障碍也会成为影响作家虚心静气从事创作的一道界沟。作家也是社会的一员，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出去，会不会触犯某些人利益？会不会引起主人公坚决反对？类似这样一些问题，作家不会不想到，也不会不分散其精力，影响其创作时的情绪。

我以为，王蓬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时，无意识地运用了其所积累的散文和小说创作经验，使其一开始便十分自觉地将其扫视点指向了人物内心世界，并全力去寻找通向人物深层心理的豁口。凭借敏锐的感受力和悟性，发现人物的“成就需要”心理最能表现其个性特征，最能显示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最容易与其实现心灵沟通时，便果断地以此作为作品表现视角，紧密围绕主人公成就需要与其实现之间的巨大矛盾展开描述。由于寻找到了有利于表现人物生命历程的理想视角，叙述显得特别自然新颖，人物的各种有关生活片段，一下子就象获得了灵魂，迅速而有序地向着这一方向归拢。不仅如此，作家在展示人物命运过程中还巧运匠心，通过悬念、伏笔、反差等艺术方法的运用，使虽然真实却相对平直的人物生活经历具有了“情节”意义；而在其“情节”的展示中，又善于通过典型细节的铺叙，表现人物个性气质，及其“成就需要方向”的全部心理基因。

王范堂报考冯玉祥主办的“西北军校”，这既深受当时北伐战争总体环境熏染，也是其成就需要心理对其行为方式的支配；而客观环境与主体心理的咬合，则决定了其必然要以军事形式，在振兴祖国庄严事业中寻求建功立业。由于其始终循着这一性格轨迹，所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关键时刻作出正确人生选择，

就是必然的了。所以作品不惜以如泼之墨，通过细微而生动的细节描述，深刻揭示了人物两次处在人生十字路口时复杂而高尚的心灵律动。层层蓄势，步步进逼，让人物处在一种决定全局成败的关键位置，这样，人物行为的全部意义就如圆雕般地被凸现了出来。

钻研茶叶工艺到了如醉如痴地步，被唤作“巴山茶痴”的蔡如桂，早在大学期间，唐代陆羽《茶经》中关于“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巴山峡川生焉”的记载，就以其神秘动人的力量敲击着他的心扉，构成其追踪先辈足迹，研制出名茶的“情结”。由于作家抓住了人物个性心理的核心，于是许多为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怪异行为，诸如主动与患病同学交换分配单位，将其妻从城市调往山区等，就找到了合理解答，自然有序地竞相涌入作家笔下，成为刻画人物性格不可缺少的情节。不惟如此，而且在作家看来，其锒铛入狱，在其生命运动的总体链条上，不但不是一种悲剧，而且是一次使其事业和精神都得到升华的难得磨炼。我以为，这既不是一种调侃，也决非虚与委蛇之辞。因为假如没有其狱中系统的最新茶叶理论学习与静思，就不会有事业上的更高追求，也不会对宇宙人生在更高水平上进行感悟。如此，也就不会有先天“晚八时”获释，次日“清晨就上了科研场地”的骇人之举，不会有虚心静气一举研制出名茶“秦巴雾毫”辉煌成果的出现。可见，作家对蔡如桂深层个性心理的独特理解和表现，是使这篇作品获得成功的关键。

作家对何兴文性格的观照，主要建立在“事业”这一基点之上。作为一名乡建筑队领导，何兴文也讲“企业效益”，其具体内涵却和有些企业领导的只顾为企业，甚至只顾为自己多赚钱，一味降低建筑质量很不相同，而是尽量降低造价，力求美观大方，确保工程质量。这就需要对建筑过程的每一环节进行严格核算，从堵塞自身漏洞、挖掘内部潜力上要效益，强化人的主体精

神，以经营道德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坚实杠杆。这就使何兴文精神境界远远超出了一般赚钱谋生的浅表层次，而将其当作一种“事业”。作家对人物这一精神境界的把握，没有浅尝辄止，仅仅停留在这一可见层面，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动态系统，尽力掘寻其精神境界形成的全部过程。其遗传基因，尤其是围绕修建房舍所出现的苦难历程，对其稳态人格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通过悬念、伏笔、对比等艺术手法，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主人公作为当代企业家的精神风采，就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剔除了眼下对这类人物的习惯看法，而投去一瞥格外尊重赞许的目光。

查舜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名青年回族作家。王蓬突出表现了其个性心理结构中的两个基点：对不幸生活命运的顽强抗争和在文学道路上的不息奋斗精神。

造成查舜不幸命运的，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凝结而成的复合物。其体现于查舜身上，则是政治和经济困顿所导致的社会地位的格外低下。作品不仅真实描述了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且表现了其面对恶劣环境不屈的抗争精神。这种精神对查舜改变自身生活命运，尤其是成为一名生产出了“拳头产品”的知名青年作家有着绝大关系；可以说，对查舜这一具体人来说，没有这种精神，不要说“拳头产品”，即使一般性作品也难以生产出来。然而这种精神毕竟又不能代替其文学创造才能；设若没有一种文学创造才能，即使有了这种精神，也写不出文学作品。应当说，二者的结合才是查舜，才可能有《穆斯林的儿女们》这样的长篇问世。这样就在王蓬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合理解释查舜文学创造才能？这是每个写查舜的作家都会遇到的、无可回避的课题，而且一定要写得令人信服，否则就不是查舜，起码不是完整的查舜。王蓬对查舜文学创作才能显然作了认真观察思考，并且融进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他紧密围绕查舜《果园里的孩子》、《月照梨花湾》和《穆斯林的儿女们》这三部（篇）界碑式作

品，翔实介绍了其文学才能的自我发现、发展和走向成熟，合乎情而又顺乎理，使人觉得，这只能是查舜其人而非别的作家。

在果青及其信徒们看来，其身归佛门，乃是其人生道路上重大而成功的一次行为选择，是其告别凡俗、走向仙佛的非凡之举。作品即以《人神之战》为题总起，然后以一种扇形结构，依次展开了对果青以下师徒十人艰难而苦涩的人生历程的动人描述。事实上，在其看似洒脱飘逸的外相背后，大多深埋着一部血泪凝成的心史。由于作品描写的巨大真实性，使我们有可能于时代主潮之外，又分明真切感受到一种似乎游离于时代之外的另一种时代情绪，它给人的无疑是一种沉重，同时还有“人神之战”中作为“人”的那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

三

读解五篇报告文学作品中有关人物经历，倒不时使我联想起作家本人的有关经历来。王蓬原是西安市人，1958年因受其父所谓“历史问题”株连，被作为农业户口“下放到汉中县张寨大队”。1964年，仅仅初中毕业，就过早离开学校，“回乡务农了”。其家庭出身决定了，举凡“生产队的一切脏活、苦活、累活，诸如：送粪、拉车、进山、割竹、伐木、修渠、筑路”等，都命中注定地要压到他当时尚显稚嫩的双肩。早上初中时，王蓬就“萌发了创作的愿望”（以上见王蓬《第一步》，《延河》1981年8月号）。他有一个十分贤慧的妻子，为了支持其事业，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由于经历惊人相似，所以阅读王蓬的《在中国，有一个作家》，当看到关于青年回族作家查舜有关人生经历，和所走过的文学道路的动人描写时，竟至怀疑这是王蓬在描写他自己。的确，查舜也受到了父亲“历史问题”株连。其上小学时，“不是穿着有如织麻袋的棉线织成的粗布做出的蓝棉袄，就是穿改小的

父亲的大腰裤子，冬天夏天的鞋子都大张着嘴”。早在上初中时，他就发现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并当着女友发誓，将来要当作家。回乡后一写几年，稿子发出去，又被一一退回。他也有一个全力支持其事业的贤慧妻子……毋庸置疑，查舜在对抗苦难的历程中，的确与王蓬有许多相似之处；而王蓬在读解、描述查舜这个同龄文友人生经验和命运时，显见也是调动了其全部人生经验，并充满了高度创作激情的。

对抗苦难，可说这是贯串《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作家》始终的基本主题。

而在其他四篇报告文学作品中，也同样表现了这一艺术母题。

台儿庄敢死队队长王范堂出生在一个充满了贫穷与苦难的旧中国。在祖国遭受日寇侵略，苦难重重的关头，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徬徨，没有丁点的泄气与颓唐，义无反顾地与日寇施加给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进行卓有成效的对抗。娘子关大捷和台儿庄血战中的出色表现，就是他敢于对抗苦难命运的有力证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由蒋介石亲手挑起的国内战争，又一次将全国人民，其中也包括王范堂自己，推入苦难深渊。面对苦难，尽管王范堂其时处境艰难，但还是适时而果断地对抗苦难，经过周密谋划，率部下七千余人安全投入人民怀抱。王范堂毕竟是一位历史人物，在其身上，尽管有足以引为自豪的赫赫战功，毕竟也有过不够光彩的时刻。因此，十年浩劫，当某些人将其后者片面夸大，强调到不适当地步的时候，他也和广大人民一起蒙受了苦难。然而，凭借数十年风风雨雨中形成的宝贵人生经验，他相信自己，更相信党和人民，终于又一次看到了苦难的逝去。

蔡如桂的苦难既有人和自然的，也有人和社会的。他要同时对抗艰苦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上某些人的明枪暗箭。就是说，其研制的“秦巴雾毫”名茶面世及不断